

中国农村正从“没有发展的增长” 的贫困陷阱中摆脱出来

——评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姚 锡 棠

黄宗智先生是美国华裔学者，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所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引入注目的观点：（1）他认为中国农村历史上出现的商品化并不必然带来乡村的现代化发展；（2）他认为中国农村的贫困根源是由于劳动力过密化引起的“没有发展的增长”；（3）他认为改革推动的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是突破中国农村过密化和出现现代化发展的起点；（4）他认为集体经济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本文是对黄教授有关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观点的简要的评述。

作者姚锡棠，1934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农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不仅在中国革命开始的20年代，中国庞大的人口主要住在农村，中国的革命，曾长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进行，而且决不是历史的巧合，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也正是从农村起步的。由于在改革开始时，中国仍然有82%的人是农村人口，因此，要认识、分析和探索中国问题，也就必须系统地、深刻地认识、分析和探索中国的农村问题。在今天把加速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改革时代，认真地分析和探索农村的发展问题更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的大国，如何实现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形态向现代经济形态的转变是研究和探索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核心。在这方面的探索中，中国学者和外国专家都做过大量的有益的工作。在外国学者中，美国华裔学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宗智先生进行了长期的独特的研究工作，并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值得重视的观点。黄宗智教授在先后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8）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两书中，根据大量档案资料和本人的直接调查所得，对华北和江南两地以至整个中国农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都做了非常系统和详细的分析。这里，我仅就《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有关中国农村长期陷入贫困的根源问题，即阻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问题所做的独具慧眼的观察和理论分析作一简要评述，

供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一、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一般的观点认为，商品化能推动经济发展，能推动经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经济形态方向发展。中国农村所以长期落后和经济停滞就是因为商品经济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黄宗智教授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早在明清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已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但公认的观点相反，他指出，中国农村的商品化并没有导致经济的质的发展，商品化并没有使中国农村摆脱贫穷的陷阱和困境。因为，正如黄教授在书中指出的，这种商品化是过密型的商品化，是一种不能推动发展的商品化。

为什么说中国农村早就存在蓬勃发展的商品化呢？

黄教授根据其他学者和他本人的大量研究，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华北也一样），指出早在1350年到1850年的五个世纪中，中国就存在产粮区产棉区，粮食以及粮食制品，棉花以及棉花制品的贸易非常兴旺。苏南是著名的谷仓，松江则衣披天下。这种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促进了一系列著名商业市镇的出现和繁荣。

同样，劳动力的商品化，做长工和短工的形式也到处出现。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外出做长工或短工，也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农户雇用长工或短工。但是，这些长工和短工，主要是短工多数为一般农户所雇用，目的是弥补人力的不足。在当时的整个长江三角洲并没有随着粮棉产品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而出现大规模的现代化生产方式。农民的生产也仍然停留在糊口水平，停留在勉强维持最低生存水平。长江三角洲也好，华北也好，整个中国也好，农村并没有因为商品化的蓬勃发展而摆脱贫困的陷阱。

那末，为什么商品化未能促进中国农村的发展和现代化呢？对此黄教授作了非常详细的不同于别人的分析。

黄教授认为，中国农村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经济。长江三角洲的历史发展表明，小农经济能推动商品化并能在相当繁荣的商品化条件下继续生存而不导致大规模资本主义式的现代经济的发展。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黄教授旁证博引，对各种理论和观点都做了分析。应用了俄国学者蔡雅诺夫有关小农经济的理论。蔡雅诺夫认为，小农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有两个方面不同：第一，小农家庭主要依靠自身劳动力而不是雇用劳动力，它的产品主要是满足自身消费而不是追求最高利润；第二，因为不雇用劳动力，小农家庭一般不进行经济核算，不计生产成本。因此，当投入的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小于市场平均工资时，一个资本主义式的企业就会停止劳动力的投入，而小农家庭则不然，只要自身的消费尚未满足，家中又仍有多余的劳动力，那就会继续投入劳动力。中国人多地少，黄教授指出，“耕地不足带来的生存压力会导致这样的劳动投入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直至逻辑上它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①由于小农家庭富裕的劳动力除投入自身以取得工作外没有其他就业机会，因此，“这个家庭把这一‘剩余’家庭劳动力投入低报酬的工作是完全合理的。这样的劳动力极少或几乎没有机会成本”。^②因此，虽然小农经济会由于棉粮等的分工不同而产生和推动商品化过程，但由于小农家庭的

劳动投入仅能维持糊口水平，当然不会有剩余产品积累，不会有资本积累。可见，人口压力虽然推动商品化，但人口压力又排除了任何资本积累的可能。

那末，农村存在的少量的雇用长工的地主富户（长江三角洲地区）或经营式农场（华北地区）为什么也没有向大规模的现代农业转变呢？原因是同样的，就是国为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廉价的剩余劳动力。正如黄教授指出的：“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抑制了经营式农场为节省劳动力而作出资本投资的动机。他们大都尽量少使用畜力，因为相对来说，畜力比人力的成本高，大量使用畜力是不合算的。”^③而且，在当时条件下，“仕商之途可得的利益远高于农业。因此，……经营式农业，并没有发展到具备资本主义企业最主要特征的阶段。成为一个为积累资本而积累资本的单位，从而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双方面的新的突破。”^④因此，黄教授得出结论说，认为“商品化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出现”的观点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符合的。中国农村的商品化是一种劳动力过密型的商品化；是没有发展的商品化。

黄教授的这种观点同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同公认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这种从中国实际状况出发，不唯书，只唯实的研究方法和形成的理论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二、关于中国农村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在作出中国农村长期存在过密型商品化这一结论的基础上，黄宗智教授进而对中国农村所以始终处于糊口水平的贫困根源同样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没有发展的增长是中国农村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根源。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黄教授首先就增长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三个重要概念：“首先是单纯的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其次是过密化，总产出在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第三是发展，即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增加。换言之，劳动生产率在密集化状况下保持不变，在过密化状况下边际递减，在发展状况下扩展。”^⑤他认为，虽然中国农业产值在总量上是不断增长的，但由于人口同样增长迅速，或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产值增长，因此，每个工作日的报酬是不变的或甚至是递减的。中国农民也就始终无法摆脱仅能糊口的贫困处境。

黄教授在书中为此作了大量分析。他首先应用了美国学者珀金斯对中国农业发展所做的大规模的定量研究。珀金斯认为，从明初到1949年，中国人口增加了7至9倍，而农业产量增长的比例基本相同。在这600年中，农业技术和封建制度没有多大变化，因此，人口增长本身是推动产量增加的主要动力。一方面人口的增加是促使小农向别处迁移垦荒，使耕田面积扩大了4倍，另一方面，富裕的劳动力使农民能够精耕细作和提高复种面积。但到后来，可耕地逐渐减少，单位面积产量也渐渐走到尽头。最后，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中国农村始终停滞在没有发展的增长——即总产量增长，但由于人口压力导致单位工作日报酬不变或递减而农民处于仅能糊口的境地。

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黄教授还对解放后在集体化时期农村的增长和发展问题作了分析。从50年代到70年代，虽然农业总产值增长了3倍，然而却仍是以单位工作日报酬不变或

递减为代价。因为在这一时期不仅人口增加了1倍多，而且，由于妇女参加劳动以及双熟制、三熟制引起的每个农民参加劳动天数的增加，投入的劳动力总工时同样增加了3倍。因此，在改革以前，中国农村虽然有了很大进步，但仍然未能摆脱“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贫困的陷阱。

黄教授关于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结论同过密型的商品化一样，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黄教授作为一个长期研究中国农村的美国学者，以独特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对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他自己见解。他反复强调的是，在中国存在一个绵延数百年的“过密化”的农村及其农业生产，这是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主要障碍。“过密”是黄宗智教授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中心范畴。在研究华北小农经济时，他称那里的经济是“过密型经济”，在研究长江三角洲经济时，他认为那儿的繁荣的商品化是“过密型的商品化”。对于“过密”这一范畴，他在书中有许多阐述。其中最简明扼要的是在本书第二编，他指出“过密”即：“伴随着单位劳动生产率降低的生产增长”。他说，经济学上讲的“增长”指的是“生产总量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的增长”；“发展”指的是“基于单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增长”。而中国农村经济，长期来处于“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奇特的现象之中，这是经济“过密化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农村长期无法走向富裕的根源”。

黄教授是一个历史学家。他从明清时期一直分析到改革以前。他认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与有发展的增长之间的区别对了解中国农村贫困和不发达的持续来讲是极其重要的”。^⑥

三、关于中国农村出现的乡镇企业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黄宗智教授饶有兴趣地考察了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他指出，这一地区在1350年至1850年间形成了过密型的农村经济；1850年至1949年，这一地区商品的程度相当高，但过密化的经济结构并未有所触动；1949年以后，在集体经济制度下，农业生产逐年增长，但是单位劳动生产率却无多大增长，整个经济仍属于过密型经济。接着，他告诉人们，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第一次为解决这种过密化的经济找到了出路。中国农村也第一次从“没有发展的增长”阶段进入“有发展的增长”的新阶段。

黄教授对于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同样有自己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有自己分析问题的独特思路，因此得出的结论也有他自己的独特个性。

黄教授仍然从中国农村存在过密型经济的观点出发，认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没有解决农村的过密化经济及其存在问题。对于我们所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黄宗智教授一方面指出这种组织形式符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强调它并没有带来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在“解散农业集体制时期”这一节中，他以江南农村农作物总产量变化的材料为根据，提出：“农村改革的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作物产量的下降或停滞”。虽然他认为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但是由于作物产量没有增长，因此，同过去“没有发展的增长”相反，而是属于一种“没有增长的发展”。因此他不赞成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过高的评价。我们必须看到，黄宗智教授对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这些评论并不是要否定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他只是认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主要成就，是乡镇企业的发

展,而不是别人所讲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就是他研究中国农村改革的独特见解。黄宗智教授在书中一开始就鲜明地指出:“我将指明,长江三角洲的关键性发展不是来自大肆渲染的个体农业生产和小商业,而是来自乡村工业和新副业。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长江三角洲乡村的真正重要的问题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在市场化家庭农业或计划下的集体农业,而是在过密化还是发展”。这一段话,实际上是他全书所要论证的主旨。

其实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出来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农村富余的劳动力显性化,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但正如黄宗智教授所指出的,中国农村80年代的改革,尤其在摆脱“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贫困陷阱方面,最为突出的成就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首先,正如黄教授在书中分析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农村就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黄教授重点调查的松江县为例,到1987年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已经从1978年的81%下降到35%,第二产业则从15%上升到49%,第三产业也从4%增加到16%。这说明,我国农村在80年代改革中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劳动力大转移,即由农业向乡镇企业的转移。乡镇企业促进了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反过密化”。

其次,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农村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松江县198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仅占23.6%,第二产业增加到53.3%,第三产业上升到23.1%。这同传统的农村是农业的社会,第一产业占50%以上比重的情况相比,具有明显的变化。乡镇企业使中国农村开始摆脱长期存在的贫穷的困境。

再次,乡镇企业的发展既使农村劳动生产率获得了显著的增长,又使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改观与发展。尽管农村劳动力已有50%左右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但是农业总产值的绝对值却仍在增长,这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已有很大的提高。以整个农村为考察的对象,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劳动生产率已大大提高。从1978年到1987年,松江县人口总数从453736人增加到491919人,即增加了8%;全县国民生产总值却从1978年的2亿多元增加到1987年10亿多元,翻了两番。与此同时,1987年全县国民收入为9.2亿元,比1978年增加6.9亿元,翻了两番;1987年全县人均国民收入1870元,比1978年增加1352元,翻了近两番。这些变化,从总体而言,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再细微地剖析一下,即可发现: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导致这些深刻变化的主因。10年来,乡镇企业的产值平均每年以29.8%的速度递增,给古老的农村带来了勃勃生机,中国农村终于出现了“有发展的增长”,即现出了伴有单位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增长。

综上所述,可见黄宗智教授分析的“长江三角洲的关键性发展”,“来自乡村工业和新副业”的观点,是客观的、正确的。松江县在上海郊区是经济中等发达的县,有一定的代表性。它的变化,也证明了黄宗智教授在书中分析的“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由于黄宗智教授认为“过密化”是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主要困难或主要矛盾,因此他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具有现实的意义。又由于黄宗智教授注意到中国数百年来各种实践都没有能解决中国农村的“过密化”问题,因此他认为80年代发展乡镇企业的成

功，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历史的意义。应该讲，对乡镇企业的意义我们还论述不够，因此争论频频发生。黄宗智教授从“过密化”问题着眼来分析乡镇企业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四、关于集体经济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使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黄宗智教授在书中认为，中国农村今天的改革，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崛起与发展同集体经济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

他强调，乡镇企业的发展在中国是依靠集体经济提供的条件发展起来的。他说：“正确了解农作物生产和乡村工业，可以使我们看到过去集体制和今日改革之间的一些根本的连续性。乡村工业发展是贯穿大跃进到大革命，再到80年代的一条直线。集体积累推动了最初的社队企业，并继续推动了80年代的进一步发展，现在还得助于大规模城市工业延伸到农村基层的影响。”^①应该讲，这样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尽管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的成果，但从它的发展史来考察，乡镇企业确实是从人民公社时期的“五匠”、“五小”与社队工业发展过来的。在松江县，1972年的北方工业会议对当时的社队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毛泽东同志当时讲“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指的就是人民公社的社队工业。这些社队工业为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准备了初步的工业基础设施、技术骨干与经营管理人才，以及同国营大工业的联系等条件。因此研究今天的乡镇企业确实不能同历史上的社队工业相割裂。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黄宗智教授不仅论述了乡镇企业与过去的社队工业的关系，而且强调正是集体经济本身（他称为“集体制”）为80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准备了条件。当然，这些条件对于80年代乡镇企业崛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有一点不容忽视，江南农村如果没有集体经济组织对于乡镇企业的统一规划、多方筹资、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就不会有今天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

黄宗智教授对于集体经济在过去与今天的历史作用，做了独特的即不同于其他西方学者的评论。

第一，他认为，不能简单地否定集体经济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由于80年代农村改革举世瞩目，国内外都有人认为中国过去的集体经济试验失败了，对集体化道路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但黄宗智教授在书中认为：“除了大跃进时期外，集体化农业并没有象被指控的那么‘激进’或‘不合理’。在集体化体制下，所有权实际掌握在较小的生产队手中。分配并不象在工厂系统那样通过标准工资，通常是基于产出。社员所得直接联系到他们所产。即使是集体制，仍是一个非常“物质性”的刺激结构，而非一个只靠‘政治’或‘精神’的刺激结构。”^②黄宗智教授的这个结论是他深入考察长江三角洲农村，重点考察了松江县华阳桥乡经济发展的历史后，得到的结论。确实，我们在松江县调查时也注意到，过去在意识形态上宣传的较多的是“政治挂帅”、“精神鼓励”，但实际上在生产队做的“仍是一个非常物质性的刺激结构”，包括在农忙时实行的“拔秧讲个头，种秧讲块头”等生产责任制与计件工分制、根据生产收入决定工分单价与社员收入等等。因此，黄宗智教授观察到的现象是一种客观的、真实的现象，分析也有独到之处。

第二,他认为不仅简单地把集体经济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在我国80年代改革步步深入的时候,国内外都有人把改革同集体经济看做是根本对立的两种选择。有的全盘否定集体化的农村发展道路,有的把改革看做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如何阐明这些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中国农村80年代改革性质这一根本问题。黄宗智教授不同意全盘否定农村集体化道路,他说:“集体化农业的实际记录也并非……一无可取。我们不应该把人均收入的停滞错认为农业产量的停滞。人均收入确实因土地的人口压力而停滞,但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除了大跃进之后数年有所下降外,在整个集体化时期均是稳定增长的。”^⑨他也不同意把改革开放看作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说:“把改革等同于种植业领域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不仅是歪曲了过去的集体制,也歪曲了今天的改革。”^⑩当然,黄宗智教授这些论述并非是站在意识形态角度提出的,而是认为改革开放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农村的“过密化”问题,因此改革开放并不否定集体化道路,并不涉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但是他得出的结论,确实很有意思。作为一个来自美国的学者,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特别难能可贵的。

除了上述这些见解十分引人注目外,黄宗智教授的研究方法也很值得我们重视。他是一个历史学家,又专攻中国经济史,但是他没有采用传统的史学方法,而是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通过实际调查和理论分析细致地描述了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各个时期变动的特点,探索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功能。同时注意比较研究,把长江三角洲与华北地区、中国与西欧农村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农村发展的独特的观点。对黄宗智教授的观点在国内外学者中都可能不同意见,但可以肯定地说,黄教授的研究和提出的观点丰富了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理论,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农村所以长期处于经济停滞的根源的认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的。

(责任编辑:陈桥二羽)

注:

①②⑤⑥⑦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10、11、12、12页。

③④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9页。

⑧⑨⑩ 均引自《长江三角洲小家庭与乡村发展》。